



ZEN BUDDHISM
AND
THE JIN LITERATURE

佛禅 与 金朝文学

刘达科 著



本书由江苏大学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佛禅 与 金朝文学

刘达科 著

ZEN BUDDHISM
AND
THE JIN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禅与金朝文学/刘达科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1130-205-9

I. ①佛… II. ①刘… III. ①佛教—影响—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金代 IV. ①B949.2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0452 号

佛禅与金朝文学

著 者/刘达科

责任编辑/顾正彤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0890

传 真/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205-9

定 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佛禅与文人结缘 009

第一节 佛禅百年 009

第二节 浸润士林 014

第三节 三教融通 036

第四节 孔门禅人 047

第五节 全真禅法 067

第二章 佛禅与文学思维 081

第一节 意境营构 081

第二节 玄想夸诞 095

第三节 体真征实 101

第三章 文学的佛禅意蕴 107

第一节 佛禅义理 108

第二节 佛禅情趣 127

第三节 佛禅题材 151

第四章 佛禅与文学话语 178

第一节 佛禅意象 179

第二节 佛禅故实 199

第三节 佛禅语汇 204

第五章 佛禅与文学批评 224

第一节 师心独造 225

第二节 圆成精熟 234

第三节 禅诗通契 238

结 语 248

征引文献要目 256

导 言

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不久,就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禅宗这一中国化的佛教派别自诞生伊始,也与文学尤其是诗体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文学与佛禅的联系、互动历来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然而其中叙及金朝的内容相对而言则较为单薄。这与过去学界对金朝文学注意不够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末以来,金朝文学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对金朝历史、文化的研究迄今也已触及许多领地。与此同时,人们对金朝文学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并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不过,就眼下金朝文学的研究格局来看,仍存在着一些尚待进一步开发拓殖的地带。佛禅与文学的关系就是金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课题之一。纵观金朝文学,自然也能体味到浓烈的佛音禅味。佛禅是影响金朝文学创作和发展的外在因素之一。根据笔者近年来涉猎的相关史料来看,金朝文人染佛习禅的风气不见得逊于魏晋南北朝、唐、宋文人,金朝文学受佛禅浸淫的程度也未必低于魏晋南北朝、唐、宋等时期,虽然其文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无法与之同日而语。金朝文学与佛禅的纠葛钩缠是有目共睹的。在研究佛禅与金朝文学的关系方面,曾出现过一些论文就若干重要作家或问题作过个案考察,如:张晶《李纯甫的佛学观念与诗学倾向》(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中国史学研究》第3辑《辽金诗学研究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姜剑云和孙昌武《论完颜璘创作中的佛禅意蕴》(《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詹杭伦《王勃〈释迦佛赋〉丁晦仁作考》(《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崔正森《元好问与佛教的关系》(《学术论丛》1999年第1期)、程亚林《〈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李正民和牛贵琥《试论佛教对元好问的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高桥幸吉《元好问与佛教——以嵩山时期为中心》、王树林《金末诗僧性英考论》(以上见赵维江主编《走进契丹与女真王朝的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姜剑云《金代佛寺禅院碑记之文化内涵》、夏广兴《地狱信仰——从佛典记载到宋金元宝卷》、田玉琪和吴松山《赵秉文诗歌创作的佛禅意蕴》、胡传志《李纯甫佛学二题》(以上见《佛教与辽金元文化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等。孙昌武《佛教在辽金元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佛教与辽金元文化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也有不少从宏观角度阐释佛禅与金朝文学关系的内容。一些有关的史论撰著,如(按出版时间胪列)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张晶《辽金史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和《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周惠泉《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在论述相关作家或现象时都对佛禅影响的问题多有涉及。上述作者都是功底深厚、建树丰伟的学人,只是由于这些专著在内容、体制方面的规定和要求,难以从整体性的角度专门就佛禅与金朝文学的关系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从整个金朝文学的研究格局来看,仍有待于进一步对这一问

题从宏观视角予以全方位的探讨和整体性的把握,并对有关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梳理。可以说,佛禅对金朝文学的影响迄今仍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并充分解决的问题。这一领地不应成为学术“准盲点”。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佛禅渗润金朝文学的史实予以整合和考究,并在此基础上做较深入的探索,以期从外部规律入手寻索12世纪至13世纪初女真族在中国北方所建王朝中的文学的某些特质。此即笔者拈取佛禅对金朝文学的影响这一问题作尝试性研究的缘起。

“佛禅”二字常被合用,然而“禅”实可被囊括于“佛”。故或许在视二字为偏正关系的前提下使用它更为科学。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事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佛教与其母体印度佛教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佛教中,流行于下层的民间佛教与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中的带有较浓重的哲学色彩的佛教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禅”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指佛家修持内容的一个部分,即“六度”中的禅定,或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又称禅定);其次,它指中国佛教的重要派别——禅宗。“‘禅’和‘定’有区别,是静虑的意思,谓心注一境,正审思虑。但中国佛教学者通常把禅和定合称,包括了更广泛的涵义。中国禅宗还以‘禅’命宗,特别重视‘明心见性’,不再限于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形式,从而进一步改变和扩大了禅定的意义和范围。”^①禅定和禅宗虽有密切、直接的联系,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禅定是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理论所共有的范畴,是佛家觉悟、果成的必经之路,当然也是包括禅宗在内的各宗僧人和居家习禅者修行共同的内容;禅宗是中国佛教的派别之一,也是中国禅的一个发展阶段,以禅定统括全部修习内容乃至

① 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2页。

一切佛法而得名。如来禅法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早期中国禅呈多元发展之势,出现过达摩祖师禅和罗什、道安、觉贤等系别以及道生禅学等,而唐代接承达摩祖师禅统绪的禅宗的出现则是佛教彻底中国化的标志。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以启悟、体证本藏于众生之心的佛性为鹄的,其声势在中唐以后逐渐压倒所有其他宗派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干。禅宗以外佛家各宗派一般被称作“教”,即言教,以其强调传授、接习经典和教义的功能、作用而名之。学界普遍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禅宗不仅是唐代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甚至是“有别于佛教整体的一个独特派别”^①。因此,本书是在平行关系的意义上将二者合称的。这一点与时下绝大多数有关研究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佛”的涵义十分广泛而复杂,佛教、佛法和佛学都可包容在内,本书涉及的范围则略有限定,主要是戒、定、慧三学中的“定”(修行实践),有些地方延伸及“慧”(教理思维),也就是说,以禅定、禅法方面的内容为主。至于“禅”,本书涉及的范围则又稍微宽泛,并不仅仅局限于禅宗,在个别地方还推及佛教禅法。由于“佛”与“禅”这两个范畴的内蕴都很复杂,所以有必要对它们略作限定和说明,以使研究有一定的规定性和可行性。

佛禅与文学的关联互动是双向的,彼此溶渗,互相吸纳,但相对而言,佛禅对文学的影响则占主导地位。袁行霈曾就禅、诗关系说:“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带来的理趣……”^②佛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催生新式文体、提供创作资源和丰富艺术表现手段

①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②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三个方面。就“佛禅与金朝文学的关系”这一课题来说,佛禅对文人、作家的生活内容、方式和情趣以及哲学观、人生观、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完善了文坛结构和作家队伍,从方方面面拓展了文学的艺术表现领域,丰富了文学的创作方法、手段和艺术思维,深化了文学的思想蕴涵,不仅使文坛产生了很多表达佛禅义理、情趣和题材的诗、词、文、小说、戏曲等体裁的作品,还以大量的宗教意象、故事和词汇为文学提供了充裕的创作资源,与此同时,对于文学思想的嬗变也发挥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完全可以说,佛禅对金朝文学的渗透浸润是全方位的,显示了特有的历史性功效。一般认为,佛禅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作用与在哲学、伦理领域的作用不同,对前者来说,积极的意义超过消极意义,而对后者来说则相反,负面影响要严重得多。佛禅对金朝文学的影响同样反映在正、反两个方面。从总体趋势来看,积极的一面还是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创作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的艺术工程。佛禅虽在本质上无意于甚至反对构建美的大厦,然而它又蕴涵、透闪着美的因子,并一代又一代不由自主地启迪了文学家、艺术家们的思维、灵感和智慧。佛禅极大地丰富、拓展了金朝文学的艺术境界,成为当今金朝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本专题的研究集中于佛禅对金朝文学的影响这一方面。本书的撰写着眼于分析佛禅语境中的金朝文学的各种现象,以期从外部规律入手揭示此时中国北方文学家沾溉佛禅的某些特征,探索此时中国北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内容、表现和特点。全书由三大块内容组成,即佛禅对金朝文人作家的影响、佛禅对金朝文学创作的影响、佛禅对金朝文学批评的影响。依据所掌握材料的情况,分为五章。第一章研究佛禅对金朝文人、作家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重大影响,从佛禅发展

百余年概况、佛禅向士林的渗透浸润、三教融通历史大潮中佛禅的性质和特点、禅儒相融背景中的居士佛教和禅道互动进程中全真道对禅法的吸纳包容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二、三、四章考察佛禅对金朝文学创作的影响,分别从佛禅与文学的艺术思维和表现、佛禅与文学创作的思想蕴涵、佛禅与文学的话语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三个方面较突出地反映了金朝文学中的佛禅意蕴和质调,以及在佛禅影响下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立意的某些特征。“佛禅与文学思维”一章以意境营构、夸诞玄想、体真征实三要素为研究重点,“文学的佛禅意蕴”一章选取作品所体现的佛禅义理、佛禅情趣和佛禅题材三方面为探讨范围,“佛禅与文学话语”一章将内容归纳为佛禅意象、佛禅故实和佛禅语汇三个系列进行考述。第五章探讨佛禅对金朝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撷取师心说、圆成说、禅诗通契说三个要点予以分析。

限于容量,本书不拟对所有内容作一般化的描述和归纳,而集中探讨作为佛家道谛三学之一的“定”(禅定)和中国佛教的禅宗对于金朝文学的影响和意义,对每一个子课题的探讨,也力求多从前人所未涉猎或未深究之处着眼,避免做重复研究或整合已有的观点。金朝既非古代佛教发展的高峰期,亦非文学发展的高峰期,其文学的成就和地位也均有限,金朝文学研究迄今仍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弱势学科。虽然文学研究界一直有不能以某个时期文学创作和发展水平的高下而判别对其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的高下的说法(笔者也赞同此言),但研究对象的总体情况(创作成就、发展水平、历史地位和现存史料的多寡等)确实对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制约性和限定性。佛禅对辽金各体文学的浸润程度不一,虽今存辽金人之诗、词、曲、文、笔记、小说和诸宫调等皆含有关涉佛禅的文字、内容或人物、情节,但各体文学受佛禅影响的程度和特点

皆不同,况且流传于今天的金朝文学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和文物史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在考察、分析时皆有所侧重,大体而言,所涉内容以诗为主,兼及其他文体的作品。也就是说,由于金诗所受佛禅影响较其他文体更为深刻、明显,故将其作为主要论述对象。本书采取文学阐释学与文学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每个结论都建立在较充裕、可靠的史料之上,同时努力做到以现代意识审视传统文化的形态和内涵,对历史积淀作新的解读。佛禅对金朝文学影响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由所有文学活动中的无数史例(包括创作和接受)而体现出来的,因此本书在论述每一问题时所举的例证往往不一而足,以使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普遍性意义。

为节省篇幅和避免繁琐出注起见,所引述的文字除今人各种撰述外,凡出自古籍(包括新刊影印本)者皆随文括注,而出自今人各类论著、编著的引语、观点和新整理本中的古人作品、佛禅言论则一般采取页下注的形式。论述、求证中随处援举的大量金人诗、文以及少量其他历史时期的作品绝大多数出自今人所编各种断代或通代的全集性总集,查找时很方便,故略而不注,仅对由于某些方面的具体原因而引自上述诸书之外的文字以页下注的方式说明。另在书后附录《征引文献要目》,胪列各种有关文献的称谓、著者或编者(包括注者、译者)、版本等内容,以便读者查检核对。笔者在研读史料和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所涉佛教各类文献较多,在版本的去取方面遵循的原则是尽可能选用今人的新整理本或较完备、精当的善本古籍。对书名较长的佛籍,一般于正文中使用其在长期流传中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简称,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则称《楞严经》;如有必要援引的同一书的异译本,乃根据实际情况标注其异名,如引自《维

摩诃所说经》(即《维摩经》)异译本之一《说无垢称经》的文字,则于所引文字后括注《说无垢称经》而非《维摩诃所说经》。

佛禅对金朝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但迄今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并展开全面、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愿就此投石探路,以引起人们对该领域的关注并进一步深入探掘。笔者的学识、水平有限,书中所云,不周全、未尽言、有错误之处当不少,敬祈方家、同仁指正。

佛禅与文人结缘

有金一朝,佛禅得以较充分地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深入地浸渗到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本章拟在对金朝佛禅的存在状态和活动概况作一鸟瞰式扫描的基础上,以三教融通的历史潮流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士林与佛禅的关系、孔门禅的兴起和全真道对禅法的接受三个问题。因为居士佛教反映了文人心仪佛禅的一个侧面,自然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金朝出现的全真道,从特定的角度来看,则可被称为有别于汉代的原始道教、魏晋南北朝的神仙道教和唐宋的符箓道教的“文人道教”,其创始人、教团领袖和骨干成员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且都受禅宗浸淫极深,有很高的佛学素养,全真禅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体现了佛禅对金朝文人的影响,是研究佛禅对文人的影响所不能绕开的对象,而以往的研究恰在这一点上有所忽略,故有必要予以重点剖析和论述。

第一节 佛禅百年

女真族立国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信仰一种原始宗教的晚期形态——萨满教,但佛教已有所渗润。《金史》卷一《世纪》载,始祖函普之“兄阿古乃好佛”。这些足以说明女真人在建立政权之前就开始接触佛教了。金朝建国后,统治者对佛教扶、抑兼之,既

拉拢佛教界上层人物以稳定社会、巩固政权,又采取各种手段防止佛教无限度地发展而危及自身利益,佛门与皇权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其间关系十分微妙。百余年间,佛教与女真统治者虽曾断断续续地发生过一些局部性的冲突,金廷也时而下诏谕示限制佛教活动,但从总体倾向来看,官方对佛教基本上是重视、保护和扶持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曾主持创建过不少规模较大的寺院,常优礼僧尼,也不断加强对佛教的管理。民间信佛、崇佛之风也十分兴盛,各地佛教活动频仍。元好问曾感叹金灭北宋以降家乡寺庙复兴的情况说:“并州,唐以来图经所载佛塔庙处视他郡为尤多。宣、政之季,废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砾之场金碧相望,初若未尝毁者。浮屠氏之力为可见矣!”(《威德院功德记》)由此可见两宋之交至有金一朝佛教“才废而旋兴,稍微而更炽”势头之一斑。佛教在金朝得到了较充分的传播和发展。

金朝佛教则主要是北宋佛教的延续,同时兼容了辽朝佛教的部分成分。金朝流行的佛教派别有华严、禅、净土、密、律等宗。华严宗的宝严、义柔,密宗的法冲、知玲,律宗的悟敏、悟铎,皆为当时著名高僧。禅宗是其中最为活跃、最有影响的派别。路铎《庆寿寺晚归》诗“清溪照眼红蕖晚,禅榻生凉碧树秋。少室宗风闻棒喝,裕陵遗墨烂银钩”便是这种情状的真实写照。王寂《鸭江行部志》记其以职事游巡鸭绿江流域时曾于此地瞻仰禅宗六祖慧能画像,可见金章宗时禅宗的影响已波及辽东。佚名《金志》有“禅多而律少”^①的记载。其实有金一朝禅宗以外任何佛教宗派的势力都是无法与禅宗同日而语的。根据现有资料来看,金境内的禅宗以临济宗和曹洞宗势力最大。晚唐五代先后形成的禅门五宗,汾仰宗

①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16页。

于宋前已销声匿迹,法眼宗入宋后红火了一阵便湮灭无传了,北宋盛极一时的云门宗的势头也于两宋之交逐渐减退消歇。这样,到金灭北宋,走俏中国北方的只有临济、曹洞二宗。临济宗是五宗中最早形成的派别,入宋后曾与云门宗并驾齐驱,并分化为黄龙、杨岐两派。杨岐派后来成为临济宗的主流,发展至南宋愈加旺隆;黄龙派的兴盛虽略早于杨岐派,但北宋亡后其声势日趋衰微消沉。黄龙派虽在南宋让位于杨岐派,在北方仍有较可观的市场,常住济南灵岩寺的道询便是金朝承传其统绪的禅师之一。僧人皓公《传衣偈》“黄龙正派涌波涛,走电奔雷意气高。云洞何人著精采,好将鋤斧振吾曹”之语说明黄龙宗的声势是相当可观的。临济宗在金朝主要活跃于济南、燕京和河南嵩山一带,其传人除道询外,重要者还有:圆性,大定间住持燕京潭柘寺,弟子中以普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五人最有名气;政言、相了,二人曾先后住持潭柘寺;教亨,起初长期以嵩山为活动基地,后来住持潭柘寺、庆寿寺,晚归少林,弟子以宏相最有名气。曹洞宗在禅门五宗中影响和势力仅次于临济宗,并踵其后于北宋末成为流行极广的派别,到金朝则与临济宗方轨并行,其声势有时甚至超过临济宗。南怀瑾说“曹洞宗的禅,在五代以后,影响宋代的道家、理学,尤其是易经的学问。道家所谓坎离交等等,都是曹洞宗来的”^①,完全符合实际。金朝的曹洞宗以燕京和河北邢、磁二州等地为活动中心。临济宗倡扬语参口辩、机锋峻烈的看话禅,曹洞宗重视缄默静坐、内观心省的默照禅,流播于金朝境内的这两个旨趣和宗风迥异的禅宗派系并峙相映,在禅法路子上相互吸纳、融会、趋同,构成了有金一朝禅宗的基本格局。临济、曹洞二宗法统一直延续到元代。此外,在金朝文

^① 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0-251页。

献中还可找到云门宗的遗迹。佚名《浦公禅师塔铭》载善浦“……十余年间，云门、雪峰，一皆参历”^①。

金后期名扬两河三晋、在朝野最受尊崇的禅师当属万松行秀。他是曹洞宗鹿门自觉一系第七代传人、住持磁州大明寺的雪岩如满的嗣法弟子，得袈裟和偈颂后人中都（今北京），先后住持万寿寺、仰山栖隐禅寺和报恩洪济寺，深得章宗器重。耶律楚材记述：金章宗秋猎仰山时，他不依惯例进献珍玩，仅“手录偈一章，诣行宫进之”，中有“成汤狩野恢天网，吕尚渔矶浸月钩”之句，大蒙称赏。翌日，章宗入山行香，屡垂顾问，手书一诗遗之，行秀泊然受之。章宗还于宫前赐钱，使者传敕命其跪听。行秀面对百般威逼，毫无所惧，“竟焚香立听诏旨”（耶律楚材《〈释氏新闻〉序》）。这种不屈于皇权威势的举动使章宗也为之折服。“行秀”之名即为章宗所赐。金室贞祐南渡后，仍留中都，复主万寿寺，旋退居报恩寺从容庵著书立说。居燕数十年间，行禅弘法，接引众徒，精进不懈，学侣云集，誉满北方，“数迁钜刹，大振洞上之宗，道化称极盛焉”（《续灯正统》卷三五《行秀传》）。蒙古陷中都后，仍备受推崇。太宗窝阔台曾赐其佛牙并尊称“万松老人”，还奉其为国师（邵元《山东灵岩寺息庵禅师行业碑》）。元定宗贵由元年（1246年）圆寂，终年虚龄81岁。行秀是金、元极负盛名的禅宗大师，有“宗门之大匠，四海之所式范”（耶律楚材《燕京崇寿禅院故圆通大师朗公墓铭》）之美誉，“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华北地区佛教界的领袖人物”^②。他“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才无碍”（耶律楚材《〈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思想十分开放。北宋以来禅宗各派互相交渗、融合，曹洞宗发展到金、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掺

① 张金吾：《金文最》卷一一〇，中华书局，1990年。

② 刘晓：《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页。